

1 引言：当前社会科学实证研究中定量方法的滥用及其问题

在当代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定量研究方法因其在数据分析和模型解释方面的显著优势而广受青睐。实证主义传统的影响使得定量分析和模型被普遍视为“科学”的标志^[1],这从一定程度上确实推进了对社会现象统计特征的考察,但方法上的偏向也日益成为学界反思的焦点,过度依赖定量手段,以“测量就是科学”的心态进行数据挖掘式的研究,不仅难以深入解释复杂的真实世界,也蕴含了更深层次的理论价值偏见^[2]。这种滥用定量方法的趋向我们姑且称之为“孔德陷阱”,用以指涉社会科学中对定量方法的过度依赖与不当应用。近年来这一方法的普及逐渐演变为某种程度的滥用,尤其在对公共治理这样的复杂开放的社会问题的解释和理解方面。自2019年起,国内部分经济学与管理学头部学术期刊纷纷发表文章纠正这种定量研究方法的滥用倾向^[3-6]。

具体来看,社会科学研究中定量方法滥用的表现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数据挖掘和分析凌驾于解释之上,过度追逐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极大地弱化和代替了对社会机制的解释理解在社会科学探索中的地位^[7]。过分依赖计量模型、智能算法与爬虫程序,对海量文本、图像、视频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而缺少对其中所反映的社会机制或行为逻辑的深入考量与把握。这种研究倾向导致了大量无实质内容的描述性研究(典型表述是:“运用文本挖掘、网络分析等技术手段,考察了XX现象的特征”),导致几乎没有任何解释或预测能力的研究泛滥成灾。例如,通过分析大规模数据集,研究者可以识别特定人群的行为模式或社会趋势。然而,这种方法的局限在于它主要关注于数据的相关性关系分析,往往忽视了数据背后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动力学。数据挖掘虽能揭示模式和趋势,但却难以提供深入的理解和解释;更严重的是,这种面向数据分析本身而非解释理论的研究取向,使得对“数据的操作”成为研究“创新”的代名词,一些研究通过简单引入或同时使用多源异构数据,被错误地视为研究设计的“创新”;另外,这种倾向也使得数据的不确定性和偏差更容易被忽视或误用。

第二个方面是模型优化的结果脱离实证检验的可能。在当代社会科学实证研究中,构建概念模型或数学模型来对复杂的社会现实进行符号化抽象与概括,是一种重要的方法论途径,体现在研究

者为了提高模型的精确度和预测能力,而不断调整和精炼模型参数和结构。然而,这种过度的模型优化有时会导致模型与其旨在解释和反映的现实社会现象之间的脱节,模型优化与演化的内在逻辑使其逐渐脱离对实证世界的检验、调整与修正的需求,结果是一些模型虽然在自身学科系统或理论体系内可以通过互相引用、优化数学结构而日趋精致与“完善”,但其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却在不断流失。这方面的具体表现,第一是参数优化胜过机制检验,许多模型研究更关注调整模型内在参数,达到预测结果的最佳拟合,但所涉及的社会机制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被忽视;第二是复杂模型难以检验,过度追求模型的复杂精致,加入各种中间变量、调控参数等,结果使得模型对数据拟合度提高,但可检验性下降;第三是文献积累取代实证反馈,相互引用体系内的模型文献本身成为“优化”模型的途径,模型脱离实证修正,成为自说自话的“理论体系”,甚至模型优化沦为论文相互引用的符号游戏,失去了科学发现的本质内涵^[8]。

这些问题说明,统计数据的机械堆砌与数学模型自我优化,脱离了社会科学的实证基础,这些都是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定量方法滥用的典型表现,既损害了研究对复杂社会世界解释力的提高,也取代了对理论机制的考察、推演与验证,遮蔽了理论体系中潜在的偏见与谬误,使得一些“成功”的社会科学理论最终沦为自说自话的积木塔,与其试图研究的对象渐行渐远。这种倾向构成了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体系的一大挑战,需要我们重新审视模型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这意味着在模型构建和优化过程中,不仅要考虑技术的“酷炫”,还要关注模型是否能够有效地捕捉和反映社会现象的本质,从而使模型更贴近现实世界的复杂性,而这亟待方法论层面的反思与探索。

2 从孔德陷阱说起：定量就科学吗？

2.1 对“科学性”的追求：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历史演变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历史演变是一个长期且复杂的过程,涉及理论的发展、方法论的变化,以及对科学性概念的不断探索与挑战。从古典时期的哲学思考到现代社会科学的定量分析,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在追求科学性的过程中充满了理念碰撞、争鸣与融合,实证主义传统与诠释主义传统之间的互动推动了方法论层面的反思与变迁,社会科学研究一直在科学性与人文性的双重诉求间寻求平衡。

定我们难以对其进行像自然现象那样“硬科学”式的研究。

在追求科学性的过程中,定量方法被赋予了过于特殊的地位。这种情况源于一种误解,即认为只有通过量化和统计验证的研究才是“科学的”。这种观念忽视了社会科学的复杂性,忽视了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异质性,将“科学性”等同于可度量性和可重复性。这种方法论的偏见不仅限制了对社会现象的全面理解,还可能导致研究方法的机械化、单一化,结果将导致明显的问题:第一是现实世界解释能力的削弱,过分依赖数据分析与模型复现,忽略了个体的行为动机、文化背景和社会结构的影响;第二是误用与滥用层出不穷,数据失真与偏差,模型误差与越界应用等难以避免;第三是理论视野的狭窄,多种定量范式的竞争,使得社会科学场域中其他认知方法可能被排斥。

孔德陷阱的存在提醒我们要对社会科学方法论进行反思和扩展,这种反思不仅涉及对定量方法的批判,还包括对社会科学研究目的和社会动力机制的深入探讨。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科学性的追求不应仅限于定量方法的应用。社会科学的复杂性要求我们采用更多元和综合的研究方法,包括对定性研究的重视,理解个体和群体行为的动机,以及对社会现象的深入分析。社会科学的科学性不仅仅是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重复性,更重要的是对社会现象的深入理解和合理解释。不断反思和规避孔德陷阱,重构定量与定性等不同方法的有机耦合,仍是推动社会科学发展的关键课题,是当代社会科学方法论反思的核心所在。

2.3 追逐科学性过程中所失去的: 定量方法的局限性

在当今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定量方法的应用已成为常态,但这种追求科学性的过程存在显著的局限性,此部分引言中已有论述,这里做一些补充,以说明定量方法往往导致对现实世界的简化和误解。

第一,数据定量分析置解释于次要地位。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数据定量分析技术往往被用来寻找变量之间的统计关系,这种方法可以发现变量间的有趣相关性,但其过度应用也导致了对数据深度解释的忽视。这方面的局限性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数据分析的表层化:在数据定量分析过程中,研究者往往关注于发现数据中的模式和趋势,而忽略了这些模式背后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动力学,这种表层化的分析可能导致对社会现象的片面理解。

(2)忽视定性信息:在数据定量分析过程中,定量数据往往被视为“硬”数据,而定性数据如个体经历、社会互动规则被边缘化,这种偏向不仅限制了对复杂社会现象的全面理解,还可能导致错误的解释和结论。(3)忽视数据的社会构造性:数据并非中性或自然产生的,而是在特定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下产生的,过度依赖数据定量分析可能忽略了数据的这种构造性,从而导致对数据的错误解读。(4)缺乏理论指导:数据定量分析是一种“无理论”的方法,极端情况下,无需要任何理论的指导,可以从数据中直接发现模式,这种方法容易导致研究者陷入“数据漂流”的困境,即研究者在数据中发现了一些模式,但无法解释这些模式背后的意义。(5)无法解释因果关系:数据定量分析只能发现变量之间的统计关系,但无法证明这些关系是因果关系,因此,数据定量分析不能用于解释社会现象背后的因果机制。

第二,模型优化而失去对应现实的意义。在定量研究过程中,模型的优化往往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方向,研究者往往会尝试通过调整模型的参数来提高模型的拟合度。然而,这种做法往往导致模型过于复杂,从而在如下几个方面失去与现实世界的联系。(1)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现实世界远比模型中的变量和假设更为复杂和多样,而模型优化过程中的简化和抽象可能导致无法准确捕捉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和动态性。(2)预测与理解的差异:模型优化通常专注于提高预测的准确性,但在社会科学中,理解社会现象的深层动因和意义同样重要,过分强调预测可能忽略了解释社会现象的重要性。(3)模型与现实的脱节:高度优化的模型可能在统计上表现出色,但却可能与现实世界存在脱节,这种脱节不仅表现在无法解释复杂社会现象,也体现在无法适应社会变化和多样性,因而也使研究结果往往难以指导实践。(4)过度拟合:模型的拟合度越高,越容易出现过度拟合现象,过度拟合的模型往往无法在新的样本中保持良好的预测性能。(5)解释性不足:过于复杂的模型往往难以解释,研究者无法理解模型的内部结构,也无法理解模型的预测结果。

3 哈耶克对孔德的诘难

3.1 研究对象相同吗? 社会科学 与自然科学的差异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虽然同属人类对科学的探索范畴,但其研究对象存在重大差异,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两者难以采用同一套方法论体系。正

个体的知识和经验由于各自的来源、形式和层次迥异,造成了个体对知识的背景、表达方式和理解程度的不同,因而人类知识是不可互通的,人们的知识获取能力、储存能力和理解能力因而也是有限的,这意味着任何尝试将社会现象简化为统一、同质的原则都是不完整的。

这种对人类知识不足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植根于理性主义传统和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后者追求建构单一的、确定的客观知识体系,这与分散的个体知识难以兼容^[8]。哈耶克同质性诘难试图在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中恢复个体知识以及“知识分散”这一基本事实的重要性,纠正主流经济学研究中长期存在的同质性假设谬误,强调了人类知识的社会构造性:个体的知识不仅是个人经验的结果,还受到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的影响,这种构造性意味着社会科学研究不能仅依赖于客观的数据分析,还需要关注和理解个体行为的多样性和社会结构的复杂性,考虑社会现象的主观性、情境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3.3 因果性诘难:对社会涌现的解释

结合当代计算社会科学研究,我们可以将“社会涌现”定义为“从个体的互动中产生的不可预期的社会秩序或模式”,市场价格和社会秩序都是社会涌现的典型例子。哈耶克认为,社会涌现具有整体性,而这种整体性无法由其组成部分的属性所完全决定,这就使得社会科学中的因果关系变得极其复杂,传统的线性和简单的因果模型无法充分解释社会现象的多样性和动态变化,我们称之为哈耶克对定量社会科学研究的“因果性诘难”。

在科学理性主义传统下,社会科学长期试图建立严格的因果模型,追求预测和控制。哈耶克的因果性诘难对这一研究取向提出了根本性质疑。他指出个体行为与群体结果之间不存在稳定的因果联系,我们需要关注个体间互动如何“涌现”出宏观上的社会秩序。在社会涌现的背景下,个体行为与宏观社会现象之间的作用机制成为关键问题。哈耶克指出,社会秩序和结构是由无数个体决策和行动的结果,而这些决策和行动又是在个人知识和偏好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理解社会涌现现象需要从微观层面的个体行为出发,探索其与宏观社会结构的相互作用(即哈耶克所谓从本能到规则的进化)^[9]。

而在方法论层面,社会科学家在理解社会涌现现象时面临着重大挑战。一方面,他们需要从个体行为和决策的微观层面出发,理解这些行为如何通

过复杂的互动产生宏观社会效应;另一方面,他们还需要考虑到社会结构和历史背景对个体行为的影响。这种双向的理解方式要求社会科学家使用更为复杂和多元的研究方法,而不能简单依靠定量数据分析。社会涌现思想主要基于个体之间相互作用和适应的过程中宏观社会秩序的生成,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哈耶克的基于个体主义方法论和自发秩序观念的进化论理性主义相契合,强调互动机制引发的多样性和结果的不可预见性,而这都与基于数理统计的因果解释存在本质差异。因为与自然科学不同,在社会科学中,理解因果关系需要超越简单的线性模型,哈耶克对定量社会科学研究的因果性诘难,决定了需要在方法论层面考虑个体行为的复杂性、社会结构的多维性,以及历史和文化背景对社会涌现的影响。

具体来说,人类社会中涌现秩序形成的机制可归纳为下面几种:(1)规则演化:个体遵循某些规则行动,同时不断调整并最终获得较优规则。(2)偶发锁定:个体随机选择,逐步被某一选择“锁定”,形成约定。(3)正反馈增强:个体间相互模仿和增强,逐步失衡并最终导向一个占有方向。(4)分工协作:不同偏好和技能的个体之间形成互惠互补。由于这些涌现机制广泛存在于社会现实中,因此,社会科学需要转向对这种新社会秩序形成机制的理解,关注个体基础上涌现秩序的形成过程,而不是去关注统计意义上稳定的因果联系。这就是哈耶克因果性诘难的主要意涵。

4 社会科学复杂性:因果性可探寻吗?

4.1 社会科学中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

社会科学中的复杂性源于社会现象的多维性、动态性和系统性,使得确定清晰的因果关系变得极为困难。社会现象通常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和个体行为等多种因素的交织,这些多维性因素相互作用,形成了复杂的社会网络和结构,使得简单的线性因果解释难以适用;社会现象又是动态发展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变化,会受到历史进程和社会演变的影响,这些变化反过来又影响社会的结构和功能;社会是由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的部分组成的整体,这些部分的互动又可能在总体上产生涌现性质,即社会整体的性质和行为不仅仅是部分的简单相加。例如,个体的社交网络行为可能在宏观层面产生全新的社会趋势和模式。

正是因为社会系统的这种复杂性特征,决定了其内在蕴含着难以约减的不确定性。社会科学中的

质性研究侧重于深入理解特定个体或群体的经验、行为和动机,这种方法通常包括深度访谈、参与观察和案例研究等,质性研究的局部性在于其深入探索个别案例或情境,力求揭示其独特性和复杂性,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能够捕捉社会现象的细微差别和深层意义^[23];相对于质性研究的局部性,定量研究侧重于使用统计方法和大规模数据分析来揭示社会现象的普遍趋势和模式,定量研究的整体性在于其能够处理大量数据,揭示不同变量之间的关联和模式,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其能够提供广泛的概括和总结,帮助形成普遍的理论 and 规律。

质性研究的局部性和定量研究的整体性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质性研究通过个案和过程追踪揭示事件发生机制,但难以归纳规律;而定量研究可以建构预测模型,但经常过于静态抽象。这种张力源于两种方法在研究方法的本质、研究数据的类型以及对理解社会现象的贡献上的差异^[24],质性研究更关注于深度和细节,而定量研究更注重广度和概括。在研究方法的本质上,质性研究更关注过程和机制,追求内在逻辑的描绘;而定量研究更看重对应关系,建构变量间的概率联系,这导致两者针对的理论范畴不同,前者偏重中微观机制,后者侧重宏观规律^[25]。在研究数据类型上,两种方法所依赖的证据也有差异,质性研究中个案过程数据、文本记录等信息更为重要;定量研究依赖大样本量化统计数据,这导致研究对象的覆盖面不同,前者更侧重典型案例,后者需要样本的广泛代表性。在对理解社会现象的贡献上,质性研究提供更富启发的情境化知识,但难以归纳一般理论;定量研究可建立更稳健的预测模型,但常因简化现实而影响解释深度。

社会科学研究面临着质性局部与定量整体之间的考验,前者关注微观个体行为的原生态特征,后者则关注宏观层面数据整合后呈现的趋势,二者之间常常难以协调一致。从质性层面来看,个体行为的意图、信念和偏好往往呈现出更为复杂和难以预测的状态,这种原生态的质性特征难以被简化为理性的最优化,同时个体也并非完全受制于整体趋势,往往会保留有一定自主性,这使得质性局部难以被唯一确定的定量模型充分概括。而从定量模型来看,为了获得预测效力,不得不采取一定程度的简化与概括,单个样本点的异常需要被整合进入总体分布规律,这使得个体行为的质性细节特征在模型构建中被弱化和模糊化处理。如何协调这两者之

间的张力,特别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过程的复杂宏大的社会叙事中,克服西方传统社会科学定量理论与本土质性的不适应,需要跳出既要定量模型保证一定预测力,又要不致过分脱离质性细节的约束,寻找可替代因果论证的新范式。

5 社会机制研究:一个替代范式

5.1 社会机制的提出

实证社会科学统计分析在因果性理论构建研究中通常会面临小样本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已经开发出了一些技术可以在少数样本的基础上形成一般性理论陈述,比如拟合时间序列横截面分析^[26],以及基于布尔代数和模糊集理论的分析技术等等。然而这些定量方法仍遭到了操作有效性等技术方面的批评,所涉及的因果关系的性质仍然是黑箱。鉴于社会科学研究中建构稳定因果关系所面临的挑战,我们提出用基于社会机制的社会科学研究,作为基于统计理论与模型的因果论证的替代性范式,旨在解决传统社会科学计量方法中存在的局限性,特别是在理解社会现象的动态性和复杂性方面。

社会机制研究范式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美国兴起的一种新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是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反思,传统计量社会科学研究往往侧重于统计关联和大规模量化分析,虽然能揭示某些普遍趋势,却往往无法深入解释社会现象的内在逻辑;而社会机制研究强调社会机制在社会秩序、社会变迁和社会行为中的关键作用,很好地回应了哈耶克的同质性诘难和因果性诘难。社会机制的通用定义是:相互关联的过程、行动和事件,它们之间通过触发、选择、筛选、强化等作用在特定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背景中相互联系,共同形成了从初始条件到最终结果之间的逻辑链条^[27],机制的核心定义是“导致结果的途径或过程”^[28]。社会机制揭示了社会现象背后的运作逻辑,包括可能的因果关系、行为模式和结构变化,这一定义中包含了几个关键要点:(1)社会机制描述的是过程,着眼于行为与结果中间环节;(2)结果形成的过程被拆解为多个相互行为事件;(3)存在逻辑上可追溯可解释的联结;(4)最终会形成稳定的因果规律或概率分布。这与传统实证主义研究更为关注变量间的静态对应以及概率关系不同,社会机制通过动态过程具体描绘事件之间的联结,使得复杂的社会世界得以打开和展现,为解释其表层现象提供了可能。

社会机制的提出和发展标志着社会科学研究

应机制,也可用传统定性定量研究方法,如调查、实验、案例研究等;“微观-微观”即个体(间)行为互动和生成机制过程,关注社会网络、群体压力和文化规范等对个体(间)行为的影响机制,用传统定性定量研究方法如个体与群体行为观察、实验、网络分析、大数据分析等也可解决;宏观2过程即利用“生成模型”解释个体行为如何互动并“涌现”出宏观社会现象,预测和解释政策效果的过程,这种涌现是复杂的动态过程,涉及到包括个体行为、组织结构、社会规范等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传统研究方法适应性受限,可用基于主体建模仿真(ABM)和生成式人工智能等计算机模拟方法。可见,这种“宏观-微观-宏观”跨层次的社会机制分析弥补了简单的宏观层面因果分析(虚线箭头4)的不足,清晰展现出了微观与宏观之间的逻辑联系,特别是解决了传统方法无法解释的自下而上的社会涌现过程。同时,这种关注微观个体自主性的自下而上的社会机制研究,也正面回应了哈耶克同质性诘难和因果性诘难。

5.3 社会机制研究的其他优势特征和意义

与基于变量相关性的统计建模不同,社会机制研究是过程导向的方法论,除通宏洞微的跨层次特征外,还具有以下优势特征:社会机制关注的是社会系统的动态变迁,而不仅仅是静态的变量截面,这更符合社会系统的本质属性;社会过程被拆解为行为事件、交互事件和环境事件等,通过关联这些事件来获得机制链条,这比统计方法把社会过程简单处理为黑箱更能展现社会现象形成的内在逻辑;所识别的不同事件角色由机制连系成一个从起因到结果的链条或网络,揭示微观行为涌现宏观结果的内生机制;社会机制发生作用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有一定适用条件和影响范围的,识别这些条件对获得机制的准确界定和应用范围意义重大。

社会机制研究的这些优势特征为理解复杂社会提供了更富启发性的新视角,关注和突出了传统方法常常忽视的要素。相对于统计变量模型对人类社会的抽象化处理,社会机制研究方法的提出与运用,使得研究者能够更深入解释复杂社会系统。机制研究打开了从变量到过程的视角,揭示事件序列之间的联结,拓展了对社会过程的理解深度。基于个体行为的机制链条反映了微观基础如何形成宏观结果,实现了机制还原与理论重构之间的统一。复杂开放的社会系统具有不确定性与随机性,而社

会机制研究提供了适应这种复杂属性的灵活理论工具与方法。社会机制研究关注过程变迁出现的阶段、节奏与临界点,为获取社会系统动力演化机理提供了新视角。

6 社会机制研究的实现路径:连续谱视角

6.1 归纳导向的机制研究方法

社会机制研究的实现路径之一是依赖定性研究技术,从具体的观察和案例研究出发,逐步构建和理解社会机制,即归纳导向的机制研究方法。该类研究方法源自实证主义研究传统,强调从特定的、详细的观察中提取普遍性的结论,特别适用于复杂且难以通过直接实验来检验的社会现象,通过对特定情境和个体行为的深入分析,识别关键行为或事件,揭示隐藏在社会现象背后的动力机制。归纳导向的机制研究方法的优势在于它能够揭示常规量化研究所忽视的社会动力机制和个体差异,然而,该类方法的局限在于其结论的普遍性受限于案例的选择和分析的深度;此外,由于高度依赖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和个案熟悉度,可能引入主观性偏差,需要后续更为系统化的检验方法获取机制结论的稳定性。但这类归纳导向的机制研究方法也是重要的社会发现和理论创新的实现路径,特别适用于新兴现象和探索性研究领域。这也是近年来随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加深,中国社会科学界尤其是管理学界对此类研究方法愈加重视的根本原因。

我们试将如下六种方法归入归纳导向的机制研究方法。

(1) 案例研究(Case Study Research):涉及对特定个体、组织、事件或过程的深入、详细的研究,强调深入理解复杂现象的背景、环境和多方面因素^[31]。广泛应用于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商业研究等领域,尤其适合于探索新的研究领域或解释复杂的社会现象。

(2) 扎根理论(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Grounded Theory):通过深入的定性分析来理解社会现象的底层机制和过程,尤其是在个体层面的体验和观点^[32]。

(3) 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 SNA):通过研究社会网络中个体之间的关系来理解社会结构^[33]。SNA可以揭示信息、影响力和资源在网络中的流动模式。

(4) 行为模型和实验经济学(Behavioral Modeling and Experimental Economics):通常结合心理学

(5) 演化博弈论(Evolutionary Game Theory): 结合了博弈论和进化生物学的概念,用于研究在竞争和合作的情境中个体策略是如何随时间演变的^[42]。特别适用于研究社会规范、合作行为以及策略性互动的演化。

(6) 系统动力学(System Dynamics): 通过构建反映个体行为和决策过程的动力学模型来研究复杂系统中的动态行为^[43]。模型通常使用反馈循环和时间延迟来描绘系统内的变化。

到此为止,我们可以对上面提到的12种社会机制研究方法做一个简单的比较特征分析。我们分别从研究方法使用的制约因素(这里只考虑数据可及性和建模的难易程度),以及各研究方法对哈耶克的同质性劫难和因果性劫难的回应程度两个维度,对以上12种研究方法进行类型学研究,得到表1。

6.3 研究迭代:个案与模型的多方法融合

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模型与具体观察之间并非是非二分割裂的,而更可能是一个逐步过渡的连续谱。最抽象的理论模型(如偏宏观、抽象,更少关注细节的系统动力学方法)和最具体的个案报告(如偏微观、具体,关注细节的案例研究方法)之间,存在着多层次的桥梁性质的概念工具与范式,演绎推理与归纳法则之间也未必存在鸿沟,许多顶级研究都是通过推理与个案检证逐步互动获得的。依此,我们将上述社会机制研究方法归入“观察-归纳”与“理论-演绎”研究方法的连续谱,得到图2。在一端,“观察-归纳”导向的研究方法重点关注于收集和描述特定社会现象的数据;在另一端,“理论-演绎”导向的研究方法涉及对这些数据的解释、概括和建模。有效的社会科学研究需要在这两端之间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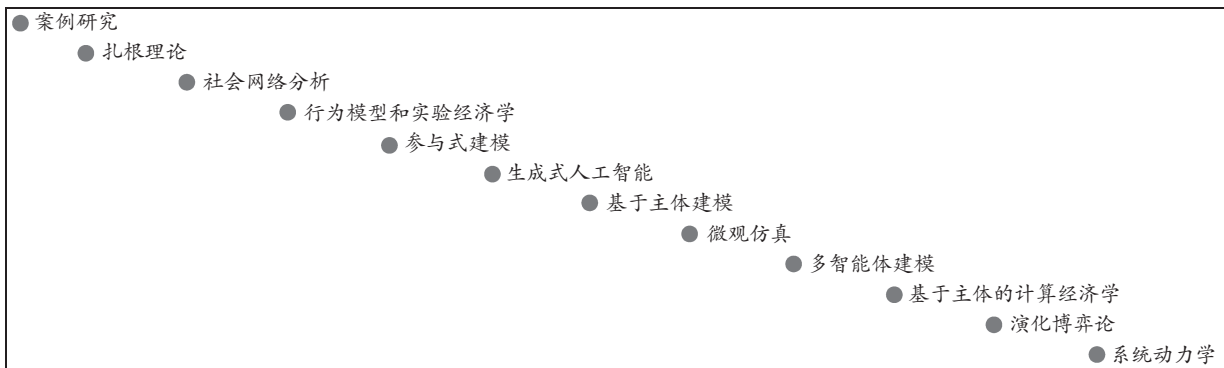
到平衡,既关注具体的社会现象,又能在此基础上构建和测试理论模型^[44]。

基于模型的宏观抽象的演绎导向方法的主要目标是简化模型和概括机制,以便构建普遍适用的理论模型,这类方法的优势在于其能够提供清晰的理论框架和预测模型,帮助理解社会现象的一般规律;这类方法的局限性在于,为了实现模型的简化和普遍适用性,往往会过于依赖引入中间变量和调节参数来达到运算效率或输出结果的最佳拟合,从而牺牲了对复杂社会现象因果关系的深入探索,因为中间变量的加入既简化又“黑箱化”了微观行为对系统结果的作用机制,弱化了模型的内生性和因果机制的有效性。换言之,这种方法可能忽视或无法充分解释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导致理论与实际社会现象之间存在脱节。

另一方面,基于观察数据的微观具体的归纳导向方法强调从具体的观察和实际数据出发,重视对个案的深入分析和理解,这类方法的优势在于能够立足于对原始微观过程的描绘,很好地保留了行为事件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能够揭示社会现象的具体细节和复杂性;也因为聚焦个别事件,这类方法的局限在于难以推广至更广泛情境,损害了研究结论的外部效度,其泛化能力较弱,即从个案得出的结论往往难以推广到更广泛的情境。

为了克服这些局限并提升社会机制研究的效果,个案与模型的迭代融合方法显得尤为重要。这种方法强调在个案研究和理论模型之间的连续谱上进行迭代往复,研究者通过建立个案与模型之间的迭代链条,使用矩阵多层次检验、过程定量建模和多案例比较等手段,做到基于个案发现机制的同时也注重通过模型与个案矩阵检验的方法来提

“观察-归纳”导向:具体、微观、细节丰富



“理论-演绎”导向:抽象、宏观、较少细节

图2 “观察-归纳”与“理论-演绎”研究方法的连续谱

社会科学方法论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然而,当前孔德主义者对数量化和形式化的过度追求,导致他们坚信只要积累足够的统计数据,运用精细的数据挖掘和定量模型技术,就能够像揭示自然规律那样系统地解析社会活动背后的稳定秩序,我们将这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上的倾向称为“孔德陷阱”。这种对精细模型和复杂定量计算的狂热,使得“数据至上”成为社会科学发展的主流趋势。但对于“人类社会”这个社会科学研究主体而言,复杂的、目的性的、反身的社会系统真的与客观自然相似吗?真的可以用简单的线性因果模型来预测和控制吗?这种做法,难道不是将社会科学简化为仅仅穿上“自然科学的马甲”的形态吗?

奥地利学派的哈耶克对此提出了质疑,他的“同质性诘难”指出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本质差异;“因果性诘难”则进一步挑战了社会科学由计量模型建立“稳定因果关系”和“科学预测”的可能性。事实上,正如本文所述,大数据分析难以解释复杂世界,理论模型的堆砌也常常偏离其所指向的现实。鉴于这种困境,本文提出以“社会机制”研究作为一个重要替代范式。通过关注行为事件之间的联结,揭示微观行为基础如何通过机制性链条导致宏观现象的涌现,为理解社会的内生发展机制、动态响应过程、跨层次涌现机制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实现路径。区别于变量分析的特征客体化和整体预测,机制研究提供了重建从行为事件到系统结果的动态联结和内生推动机制的途径,在该过程中,文章也强调了规避过度简化和泛化的问题,以保证对复杂世界的合理和精准描绘。

然而,社会机制研究作为一种从案例发现到过程解释的方法,如何建立其系统性?如何避免偶然性?社会科学内在的“科学性”规范要求又将如何在方法论上实现?这些都是摆在社会机制研究面前的新课题。本文提倡归纳导向与演绎导向的融合,通过研究迭代实现个案考察与理论模型之间的互证共生,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一条可能路径。但是否还存在其他可能的路径?探究人类社会的多维复杂性还需要哪些新的方法论工具?如何明确界定不同层次的机制范围、建立跨层次对应、实现多尺度模型检验与验证?这些都将未来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重要方向。我们有理由相信,社会科学研究这个伟大的工程将不断深入和扩大方法论视野,以适应和描绘人类社会的本真面貌。

参考文献:

- [1] CAIRNEY P. The Politics of Evidence-Based Policy Making [M]. 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 2016: 1-12.
- [2] BYRNE D, CALLAGHAN G. Complexity Theor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M]. Routledge, 2022: 1-7.
- [3] 于文轩, 钱亚玲. 定量研究方法在公共行政学研究中的应用——基于 PAR 和 JPART 的文献评估[J]. 新文科教育研究, 2023(3): 46-57.
- [4] 经济研究编辑部. 破除“唯定量倾向”为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而共同努力——《经济研究》关于稿件写作要求的几点说明[J]. 经济研究, 2020, 55(4): 214.
- [5] 李志军, 尚增健. 亟需纠正学术研究和论文写作中的“数学化”“模型化”等不良倾向[J]. 管理世界, 2020, 36(4): 5-6.
- [6] 刘润泽, 巩宜萱. 回顾与反思: 定量研究在公共管理学科的滥用[J]. 公共管理学报, 2020, 17(1): 152-158.
- [7] BOYD D, CRAWFORD K. Critical Questions for Big Data: Provocations for a Cultural, Technological, and Scholarly Phenomenon [J].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12, 15(5): 662-679.
- [8] FRIGG R, REISS J. The Philosophy of Simulation: Hot New Issues or Same Old Stew [J]. Synthese, 2009, 169(3): 593-613.
- [9] GUBA E G, LINCOLN YS. Competing Paradigm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M]//DENZIN N K, LINCOLN YS,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Sage Publications, Inc.: Thousand Oaks, 1994: 105-117.
- [10] TASHAKKORI A, TEDDLIE C. Mixed Methodology: Combining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 [M]. CA: Sage Publications, 1998: 3-19.
- [11] [英]弗里德里希·哈耶克. 复杂现象理论 [M]//弗里德里希·哈耶克. 邓正来, 译. 知识的僭妄 哈耶克哲学社会科学论文集 [M]. 北京: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14, 01: 92-123.
- [12] [英]卡尔·波普尔. 科学发现的逻辑 [M]. 查汝强, 邱仁宗, 译. 杭州: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2008, 10: 249-259.
- [13] [英]弗里德里希·哈耶克. 科学的反革命 理性滥用之研究 [M]. 冯克利,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3, 02: 17-29.
- [14] [英]弗里德里希·哈耶克. 法律、立法与自由 第1卷 规则与秩序 [M]. 邓正来, 等, 译.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0, 01: 55-62.
- [15] [英]弗里德里希·哈耶克. 自由秩序原理 下 [M]. 邓正来,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61-82.
- [16] PATOMAKI H, WIGHT C. After Postpositivism? The Promises of Critical Realism [J].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000, 44(2): 213-237.
- [17] [英]弗里德里希·哈耶克. 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 [M]//弗里德

(2)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Mechanism-Based Empirical Research Methods in Social Sciences

Li Dayu¹, Mi Jianing², Song Lili³ · 14 ·

(1. School of Fina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Harb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Harbin, 150028, China;

2. School of Management,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arbin, 150001, China;

3.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25, China)

Abstract ID: 1672-6162(2024)01-0014-EA

Abstract: In facing the challenges of contemporary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a critical reassessment of the pathways for implementing empirical research methods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based research methods in social sciences, with special attention to avoiding the "Comtean Trap" and responding to Hayek's challenges. The article first reviews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methods, particularly noting Comte's positivism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quantitative trend in moder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methods. Although Comte's method advance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sciences, excessive quantification led to data mining replacing explanation and models becoming detached from empirical reality, known as the "Comtean Trap". Meanwhile, Hayek's challenges of "homogeneity" and "causality" provide important reflective perspectives. He emphasized the dispersion of knowledge, the complexity of social systems, and the limitations of prediction. Consequently, the complexity and openness also make the construction of stable causal relationships in social sciences a challenge. Based on this, the article proposes research on social mechanisms as an important alternative methodological pathway. Social mechanisms focus on processes, identify the roles of events, and construct their connections, opening a more in-depth interpretive pathway to the social world than variable models. Upon comparing different social mechanism research methods, the article constructs a continuum of research methods based on induction and deduction, emphasizing the enhancement of research effectiveness through the iterative integration of cases and models, thus providing an important supplement and expansion to the diversified methodologies in social sciences. Finally, the article critically introspects the mechanism-based empirical research methods in social sciences, emphasizing that although these methods have their advantages, in facing the diversity and complexity of social phenomena, there is also a need to actively seek innovative methods to respond to the new challenges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Article Type: Research Paper

Key Word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Methods, Comtean Trap, Social Mechanisms, Causality, Complexity

(3) Refining Variable Measurement in Quantitative Public Policy Studies through Concept Analysis

Li Huanhong¹, Xue Lan¹, Xu Jianhua² · 29 ·

(1.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2. College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ID: 1672-6162(2024)01-0029-EA

Abstract: Quantitative research on public policy has been widely conducted to provide insightful information for policy making and implementation. In this stream of research, the general pattern is that mor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quality of data and the specification of statistical models and less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concepts and their measurement validity. Quite often, simplified indicators are used to measure complicated reality, which ensures the operationalizability of variables but may cause measurement bias. How to improve measurement validity is an important issue to be further explored. This study proposes an approach of using concept analysis to improve measurement validity, and the logic and operational details of this approach is e-